

在社会大变革中上大学

○唐绍明（1952届经济）

高尔基有篇名著《我的大学》，什么是社会大变革中的我的大学？

我1948年秋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。这是我第三次冲刺的最后成功，不仅自己高兴，也得到一番友情的庆贺。在清华图书馆的楼下进口处，巧遇图书馆的马文珍先生，他说：“好啊，唐绍明，好好研究《资本论》！”此时东北大地炮声隆隆。

经济学的第一课，是陈岱孙教授讲授“经济学概论”，教室在科学馆楼上，开讲前朱声级先生在黑板上写上 Fairchild 等人合著的英文教科书名。课后我到图书馆去查参考书，看到有许多介绍凯恩斯的

书，听说系里主讲教师徐毓楠教授就是凯恩斯的学生。

开学刚过两个月，12月13日上午，我们正在同方部上“经济学概论”课，突然远处传来几声巨响。陈先生急忙收拾教案，大家惊恐地跑出教室。从此，停课，护校，不几天清华园解放了，大家欢欣鼓舞，终于盼来了这一天！

一、喜庆与困惑

怎么办？一面倒，学苏联。苏联实行的是“统制经济”（指计划经济），是社会主义的；凯恩斯讲的是自由经济，是资本主义的，今后还用得上吗？人们高唱“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”，却难掩心头的迷惑。

更困惑的是，社会变了，我们的思想跟得上吗？艾思奇“三进清华园”，在大礼堂开“大课”，讲社会发展史，树立劳动观点、阶级观点、群众观点、辩证观点，一时成为全校涌动的热潮。

我那时参加了校外识字班的义务工作，每周六下午去给附近村子的孩子教识字，地点就在清华园南门外东侧一间土地庙里。我教他们读书、写字、动脑、用手。我举起双手问道：“这手是干什么的，知道吗？”出乎意料，他们异口同声地喊道：“干活儿的！”啊，干



1948年经济系一年级部分同学游玉泉山。
前排左起：唐绍明、才金城、马敬鹏，后排左起：米鸿才、郭和平、沈同学、张一村

活的！是劳动啊！他们从小就懂得生活要靠劳动来创造，直叩“劳动创造世界”的真谛。真理源于生活，就那么简单，那么质朴！

我不敢小觑这群幼小的孩子，就动手记下自己的感受，写成一篇文章投寄《大公报》（一度更名《进步日报》）。编辑为文章取名《手》，我给自己起个笔名“唐膺”，表示“服膺”马克思列宁主义。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投稿。

1949年冬，我参加了京郊土改，来到石景山区麻峪村。这是学校利用寒假组织法学院师生参加的一项社会活动。我们驻进农村，访贫问苦，忆苦思甜，分田分地。该地临近京西根据地，听到许多革命斗争故事。

京郊土改是“和平土改”，但不是没有斗争。在上岸村开过一次全区群众大会，斗争一个恶霸地主。我经历了这场阶级斗争的实际体验，感触很多，回来后写成一篇《寒假里的“大课”》，投寄《中学生》（一度更名《进步青年》）杂志发表。

1950年暑假，我主动申请，跟随社会系师生参加中央劳动部的一个考察团，赴中南区调查工矿劳动保护情况。我所在的分队来到江西赣南大庾县西华山钨矿工作了一个月。在老矿工的带领下，进茅棚，钻窿洞，了解矿工的艰辛和苦难；在和老同志的朝夕相处中，听他们讲那惊心动魄的革命故事。我们唱着“罗霄山脉的中段……”的曲子，分享井冈山老区人民的解放喜悦。

一路回北京，一批批军车和我们伴行。抗美援朝打响了。接着报名参军参干，开展宣传活动。那时我已加入新民主

主义青年团，组织活动非常活跃，几乎占去我们大部分课余时间。

1951年暑假，我和班上几位同学，按照团市委的要求，到北京东郊来广营进行青年团整顿工作。未等工作结束，又接到教育部指令，让各大学文法学院停课一年，全体师生去解放新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。这意味着我们要用土改实践来代替写毕业论文了。

回顾大学四年，适逢社会大变革，人虽进了新社会，头脑未必脱离了旧社会，怎能行？我们在参加政治学习的同时，还积极主动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，努力去了解工农，认识新社会，摒弃旧思想，确立新观点，克服个人主义，树立集体主义。花时耗力着实不少，白废吗？不，为使自己成为新社会的主人，我觉得值得。

二、通识与专精

解放不久，学校很快恢复了教学秩序。这时从系里传来一个消息，新开设的“微积分”课取消了。开设微积分原本为日后学数理经济打基础，而数理经济作为一门新学科，正在西方经济学界升起。它的取消无疑传出信号，今后教学要向苏联计划经济转向了。

什么是计划经济？学校请来苏联专家玛卡洛娃做报告。连续几个晚上，在大礼堂开讲，座无虚席。我看见徐毓楠教授也来了，找不着座，在最后一排后面站着听。玛卡洛娃讲一段，让翻译翻一段，尽是些数字和法令，提不起人们的兴趣，给我留下一个印象，好像计划经济里统计的作用很重要，今后搞计划经济大概只须学好统计和会计就行了。

大一、大二上公共课，有国文、英文，还学了一阵子俄文，学了雷海宗教授的“中国通史”、金岳霖教授的“逻辑”。为适应形势变化，学校聘请了《资本论》翻译者之一王亚南教授来讲马克思主义“政治经济学”，作为文法学院必修课。我们还上戴世光教授的“统计学”，余肇池教授教的“会计学”。到了三年级，上陈岱孙教授的“财政学”，赵人隽教授的“货币和银行”，萧嘉魁副教授的“国际贸易”。本该继续选修“高等统计学”和“高等会计学”，但此时我们对计算型的学科已不感兴趣，唯独想跟陈岱孙先生学“西洋经济思想史”。不巧陈先生因病停开此课，失望之余，我和张春辉、纪树立等同学改选了潘光旦教授的“西洋社会思想史”。

那时学制比较灵活，选修比较自由。我们根据自己的兴趣，加上对未来工作需要的推测，又选修了吴景超教授的“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”、孙毓棠教授给研究生开的“中国近代经济史”、吕叔湘教授的“语法与修辞”，有外国留学生专

修。还想继续学英语，就和米鸿才等几位同学选修了外文系的一门课“Bible”，由一位英国牧师 Leo-Woolf 作为一门学科来讲授，同堂上课的有外文系的段至诚、宋以敏。

我还翻阅了马克思、恩格斯的《共产党宣言》、斯大林的《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》，说不上有多少了解；倒是加里宁的《论共产主义教育》我喜欢，每天早上上课前，都会来到图书馆旁门台阶坐下看一段。

我这时已没有多少时间看小说了。中学时很喜欢看的俄罗斯文学作品，已和我渐行渐远；但屠格涅夫的《罗亭》所启示的不要作“语言的巨人，行动的矮子”，常萦回脑际。

那时师生关系比较密切。我们课余时间去看过系主任陈岱孙先生。他一眼看到印尼华侨叶惠权同学就说“你是广东人”。他对我们说，经济学是“经世之学”，西方经济体系和我们社会不同，他们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不适于我们社会，但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分析经济活动的知识和经验，



1952 届经济系毕业生合影。第一排左 1 唐绍明

对我们还是有用的，鼓励我们安心学习。陈先生毕生致力于教书育人，桃李满天下，令人敬佩。解放后结合教学，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，在上世纪90年代出版了《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》巨著，厘清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源流，揭示了马克思经济学说的继承性、开创性、科学性的特质，为进一步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奠定基础。

潘光旦教授教的“西洋社会思想史”更有趣。他介绍了西方各流派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因的不同解说。有生物学派、地理学派、历史学派、文化学派，等等。马克思的学说也是一派，归于经济学派（潘先生说你们正在学习“政治经济学”，这里就不介绍了）。真有点“百花齐放，百家争鸣”的架势。他说各派所云都有一定的道理，都应看作是影响社会总体发展的重要因素。对于学派，不可要求它在深入某一层面时顾及其它层面；当然也不应固执某一层面而废弃其它层面。潘先生学识渊博，思想开阔，能言善辩，著述等身，在学术上主张独立、自由和宽容，他还约我们到他家里上课，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有一件事不能不提一下。解放初，马列学院艾思奇同志多次应清华师生邀请来校做报告，讲辩证法，他每次都批判形式逻辑。这下把逻辑大师金岳霖惹毛了，在大礼堂当众回敬他：你的报告讲得好，就因为你讲的句句符合形式逻辑。后来哲学系专门就这问题请艾思奇来开研讨会，在图书馆楼下会议室公开举行，冯友兰教授主持。我慕名而去，看见金岳霖一上来就对艾思奇开炮，质问他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有没有区别？艾思奇谦逊地说，我们

在解放区，长期被封锁，比较闭塞，沿用了苏联哲学界一些提法，确实把二者混淆起来了，批形而上学连带把形式逻辑也批了。他说，今天来清华，和各位先生交换了意见，又收到许多赠书，回去要好好研究。艾思奇的谦虚，体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“谦虚、谨慎、戒骄、戒躁”精神；金岳霖的执着，表现了对真理追求的真诚。二人在真理面前对阵，尽显学者的崇高风范和友谊。后来艾思奇“三进清华园”，受到全校师生欢迎；而金岳霖随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意愿不断增强，提高了对党的认识，终于成为一名共产党员。今日思之仍能感到春风化雨的和煦。

我1952年毕业，至今六十多年了，回首往事常感遗憾。毋庸讳言，那时建国肇始，学校活动较多，对正常教学秩序有一定影响；而我不是一个好学生，学习太个性化，太偏于社会实践而轻视正课学习，错失了许多唯名校独具的从师受业的机会，没有读很多书。不过我也感到欣慰，清华精神，它的传统，它的作风以及社会变动中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，从课堂到宿舍，从上课到社会实践，从校内到校外，从老师到同学，一句话，清华的风格，自由，多彩，充实，无时无刻不给我的心灵以浸润和滋养，使我懂得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书本知识可能忘，做人做事的道理不会丢。我特别感谢老师们的教诲，钦佩他们宽阔的胸怀，在社会大变革中，为了使国家摆脱百年屈辱、使民族实现伟大复兴，历经磨砺，忍辱负重，矢志不渝，默默奉献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，永远值得我们景仰！

三、土改与毕业

我的大学最后一年（大四），不是在校园里上的，而是在农村大地上的。

1951年10月，我们参加了广西土地改革运动。北京来的大学师生分别组成两个团：清华、燕京一个团，分到南宁；北大、辅仁一个团，分到柳州。下乡之前，我们先后在北京（北大红楼）、汉口（一家打包厂）、南宁（心圩）层层集训，董必武、陶铸、杜润生、陈漫远、何伟、乔晓光等领导同志先后给我们做报告，使我们每个参加者对土改的意义、方针、政策、步骤、方法有了一定的了解。

开始时并不知道会去哪里土改，到汉口后才知道是去广西，一下子炸开锅了。早就听说那里是国民党逃离大陆的最后据点，留下200万残兵就地转成土匪，气焰十分嚣张。我们班上有一位万家义同学，北京刚解放参加“南下工作团”，来到广西，就在这不久前下乡工作时被土匪杀害了。针对这一思想，团部做了许多工作，介绍情况，分析形势，消除顾虑，鼓舞士气。后来还是陶铸同志出面做报告，响亮地喊出：既然来土改，土改就是革命，革命就会有牺牲，革命不怕死，怕死不革命！心狠下来，反倒开朗了。

到邕宁后，集中到郊区心圩乡学习，住进一所正空闲的培训越南干部的学校，做入村前的最后准备。天气潮热，蚊虫丛生，有一同学天亮起床，竟发现床下盘着一条蛇！我们从北方来到南方，对气候、居住、饮食很不习惯，社会系一位蒙古族先生，就因身体不适，经领导批准回学校了。能否经得起农村艰苦生活的考验，成了这期集训的一个主题。通过学习大家热

情高涨，有两位燕京女同学，特地来到村前水塘，舀上一碗水就喝，以表进村和农民“三同”的决心！

心圩集训后，同学们按小队编队，配合地方干部，分到邕宁14区各个村去。我被分配到一中队一小队，随队进驻邕宁县陈西村（属上尧乡）。

一中队一小队是中队长张志民直接掌握的重点，要求工作先行一步，提供经验。小队长荀义振，是位工农干部，山东汉子，当过武工队员，斗争经验丰富。他把我留在身边，白天一块跑村入户，晚上帮他整理记录、上报材料。同学们进村后干得十分出色，在各工作阶段都摸索出不少经验，如陈泽涵的培养“根子”、谭振樵和唐涵英的“扎根串连”、张春辉和叶滋章的发动青年群众、张健元的划分阶级，等等。我就组织他们写成文章，送团部登《土改导报》。

农村生活果然艰苦。参加劳动自不待言，住就住在贫雇农家中，吃贫雇农的饭。潮热的天气，加上卫生条件差，很多人生病，但是大家都坚持下来了。难能可贵的是老师们的历练和体会。担任工作团副团长的吴景超教授，专门写文提示同学们，进村后要认真学习政策，虚心向老同志学习，诚心诚意向群众学习。赵人隽、徐毓楠、全慰天（社会系老师）和荀义振一起，总结“串连”工作“走群众路线”的四个步骤：准备充分、分工适当、场合对头、方法恰当。省土改委的《广西土改简报》予以报道。

第一期结束后，经过短暂的整顿，第二期很快铺开。我这时接获通知，调离一中队，派到邕宁16区金陵镇陆村乡担任土改工作队小队长。队员七八人，全新组

□ 纪念清华园解放70周年

建。副队长陈良是音乐家，不久后离队；队员有黄妙，是广西电台女播音员；大学生只有一位燕京大学梅绍武，是梅兰芳的公子；还有一位地方干部，是越南华侨；有两位刚抽调上来的农村积极分子。领导我的中队长是严秋，邕宁县县委书记；副中队长是王宗一，中宣部宣传处处长。就这样我离开了所熟悉的一中队的同学、老师和领导，单枪匹马和一帮新战友来到这个远离南宁、全然陌生的环境搞土改，据说离村30里处还有土匪盘踞。我感到孤单、心虚、紧张，转眼一想，这也许是对我入党申请的一次考验？船在邕江上行驶，我的心七上八下。

进村的当天，中队部给我发了一支驳壳枪，让我全天佩带不离身。我晚上睡觉时把它放在枕边，最初几天还开着栓睡，随时防备土匪来袭。后来又给我队发来一支步枪，交给民兵。毕竟这时全省“清匪反霸”已胜利结束，大环境好多了。以后和群众搞熟了，警戒放松了，枪佩在身上好像没什么用。我来到村外一处池塘，朝树梢小鸟打了4枪，开了个戒。

陆村是一个乡，分为南北两个村。户数和人数不记得了。我和梅绍武做了分工，我抓全面，重点抓北边壮族村，南边汉族村由他分管。尽管情况仍很复杂，斗争依然艰巨，由于有第一期土改经验的指引，工作好做多了。我们深入发动群众，依次开展忆苦思甜、扎根、串连、划阶级、分田地、组织农会、建立政权等工作。久而久之，我逐渐听懂一些壮族话，也开始用白话（广东话）和群众交流，相处融洽。从2月进村，搞了四个月左右，胜利完成任务。接着团部又让我去别的小队协助工作，在那里结识了西南联大的王

景山学长。前两年，我和他取得联系，他翻出当年的笔记本，上面清楚地记有我的名字。我们一起回忆那段激情的岁月，共同兴起“同一首歌”的感慨！

土改后期，正值春荒，青黄不接，农民生活十分艰难，但困苦掩不住他们的喜悦。“耕者有其田”是千百年来农民世代代的愿望，今天实现了。从此广大贫苦农民不仅能养活自己（虽然是低水平的），还积极支援国家。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农民翻身了，解放了，这将迸发出多么伟大的革命和建设的力量！我为此而笃志自豪！

轰轰烈烈的十月土改已经过去66年，许多事情已经淡忘，但刻在心上的印记却没有磨灭，也不会磨灭。土改是我人生路上的一块里程碑，标志我对农民，对社会，对党的领导、群众路线、工作方法有了较深的领悟，战胜困难的勇气增强了，为人民服务的决心更坚定了。土改无疑是一次最好的“毕业实习”，为我毕业参加工作打好了基础。

1952年6月，我们回到清华园。经过土改总结（在南宁）和毕业总结（在清华），我要求入党的愿望更强烈了，就动手给远在广西的严秋同志写了一封信，讲了我的入党愿望，征求他对我意见。他很快给我回了信，热烈支持我入党。我把这封信连同入党申请书一并交给了党组织。

1952年8月，经过清华党组织的审查批准，我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；同时我也拿到清华大学1952届经济系毕业文凭，成为清华大学毕业生。从此，我告别了社会大变革中的我的大学，开启了我人生道路上洒满阳光的新征程。

2018年7月